

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

李 锦 绣

《唐六典》卷八弘文馆学生条注略云：

补弘文、崇文生例：皇帝缙麻已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已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并听预简，选性识聪敏者充。

弘文馆、崇文馆为唐宫廷内贵族学校，其简择标准严格，学生应明经、进士时考试标准较松，终唐一代，贵族子弟争趋赴之。弘文、崇文二馆生的简补考试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唐初入二馆习业与后期国子监衰落后诸生入馆习业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二馆生徒制的形成及其在唐后期的变化，敬请读者指正。

一

弘文馆学生最初由两部分组成。《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条略云：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生）。

太宗武德九年七月玄武门事变后，大兴文教，弘文馆置学士同时，又招收了第一批学生，这些学生为三品以上的王公子弟，这

实际上是秘书外省小学的生员。《唐会要》卷三五学校门云：

武德元年十一月四月，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

武德元年唐刚取得政权，即着手学校建置，小学是唐初学校建置中的一项，其招收生员为宗室及功臣子孙。武德七年天下平定后，小学生员再一次扩大。《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七年二月条云：

丁巳，上幸国子监，释奠，诏诸王公子弟各就学。

王公子弟所就之学，即秘书外省的小学。它虽设于武德元年战争未已之时，但也不是子虚乌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盖文懿传云：

武德初，历国子助教。时高祖别于秘书省置学，教授王公之子，时以文懿为博士。文懿开讲《毛诗》，发题，公卿咸萃，更相问难，文懿发扬风雅，甚得诗人之致。贞观中，卒于国子博士。

可见武德中的秘书外省小学不但存在，而且讲学甚盛，“公卿咸萃”。秘书省小学教员由名士中选拔，未有定员，有类以后的弘文馆学士。秘书外省是唐初主要的藏书之所。

太宗夺取政权后，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文化中心。弘文馆实际上是秦王李世民文学馆的翻版。《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九月条略云：

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道玄，参军蔡允恭……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

秦王文学馆为其夺帝位立下了汗马之功，高祖所谓“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①，正也以理解文学馆对李

世民影响之大。李世民玄武门事变后首建弘文馆，所选学士，基本上未超出当年“登瀛州”的十八学士范围，学士们“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②与十八学士分三番更直论事如出一辙。这时的弘文馆不但是文化中心，更具有政治谘议的性质，而将原秘书省小学图书及学生移入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内，也含有将王公子弟纳入自己统治领域、统一文化教育的目的在其中。秘书外省小学生入弘文馆是这一政治背景下的结果。这是弘文馆生的第一个组成部分。

《唐六典》卷八弘文馆学生条下注云：

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黄门侍郎王珪奏：“学生习书之暇，请置博士，兼肆业焉。”敕太学助教侯孝遵授其经典，著作郎许敬宗授以《史》、《汉》。二年，珪又奏请为学生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试贡举，兼学法书。

弘文馆生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习书生，这出于太宗个人爱好和当时甚重书法的社会风气，但单纯习书是不行的，为这批习书生很快配置了经史老师，习书生也走上了考试经业、参加贡举的道路。

由于弘文馆生由以上两部分组成，它具有与国子监生不同的特点，其一，既然承袭的是“小学”余绪，所招学生年龄不大，据《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国子生入学年龄为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当然也有些因特殊才能而早入学者，如《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中记载，萧颖士“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权文公集》卷二五权自挹墓志记载其十四太学明经及第，《毗陵集》卷一一故给事中赠吏部侍郎萧公墓志记载，萧直十岁能属文、工书，十二游上痒，但这仅为特例，一般情况下，国子监生年龄较

大，而且越往后越大，开元二十一年规定州县生二十五以下，庶人二十一以下可补俊士^③，其后落第举人充斥太学，国子监生的入学年龄更无法保证了。而从已发掘的史料看，二馆生的入学年龄以小居多。如李思训，“十有四，补崇文生”^④，徐琇，年十五，补崇文生^⑤。崔孝昌，“年甫十三，以门子补修文生，明经上第”^⑥。崔泰之，“年十有二，游昭文馆对策高第”^⑦陈诸，“年八岁，弘文馆明经擢第”^⑧。于知微，“永徽元年，补弘文生，爰以佩觿之年，且恋过庭之训，特降恩旨，许其在家，”^⑨“童子佩觿”，于知微为弘文生可能在十岁左右，故许其在家。以上诸例，均表明二馆生入学年龄小，不象国子生一样，限在十四以上，故而史籍中记载入二馆生时，多称“少补”，而入国子学则称“弱冠”，二馆生年龄小是因为它是以秘书外省“小学”发展而来的，当然这也符合贵族子弟要求及早入仕的愿望。

其二，二馆生的书业有自己的特色，经、史、书法三项并习。二馆生习书上条已论，此不赘，诸史也是二馆生的重要学习内容。《唐六典》卷二考功员外郎条^⑩略云：

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者，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字音典正。

二馆生习前四史，可应一史举。《唐会要》卷七六三《传》门长庆二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略云：

伏惟国朝故事……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举。

弘文生习史试史，体现了太宗以史为鉴的思想在贵族子弟教育中的影响。《旧唐书》卷八七裴炎传记载，其“少补弘文生……在馆垂十载，尤晓《春秋左氏传》及《汉书》。”经、史并重、书法兼习，是唐前期二馆生的习业特点。

弘文馆地址多次改移。贞观三年，移于纳义门西，九年，移

于门下省南，其后移于大明宫，其馆亦在门下省南。^⑪武德时小学设于秘书外省，贞观时移入门下内省，置入宫内，真正成为了一所宫廷学校。

仪凤中，因馆内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但详正学士之职因人而异，有的也因才而教授馆内学生，如贾玄赞“迁大学博士及详正学士。嗣圣初，授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仍于弘文馆教王子读书”^⑫，可见玄赞为详正学士时，既已于弘文馆教王公子弟读书了。弘文馆生由诸学士教授。景龙二年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专攻文之士以充之^⑬，开元年间，五品以上称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皆无员数，以他官兼之。弘文学士、直学士除详正图书、参议礼仪制度外，主要任务为教授生徒^⑭。此前期弘文馆概况。

二

有关崇文馆的设置，诸书记载不一，本段试详考之。

《唐六典》卷二六崇文馆学生条注云：

贞观中，崇文馆有学士、直学士员，不常置，掌教授生徒等业。

据此，似贞观中已有崇文馆，并有学士及生徒，但《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崇文馆条注云：

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显庆元年，置学生二十人，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曰崇文馆，有学士、直学士及仇校，皆无常员，无其人则庶子领馆事。

《新志》所记与《六典》不同。《唐会要》卷六四崇文馆条云：

显庆元年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许之，始置二十员。其东宫三师三少宾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卫率及崇贤馆三品学士子孙亦宜通取。至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贤馆为崇文馆。（避章怀太子讳也。）

《会要》亦将崇贤馆置学士、生徒置于显庆元年。有疑问的是，东宫崇贤馆置于贞观十三年，其中若无学士、生徒，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六典》所记贞观中崇文馆有学士生徒，是否正确呢？这还需要我们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来回答。

太宗即位后，立承乾为太子，贞观中期，太子储位不稳，《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濮王泰条云：

（贞观）十年，徙封魏王，遥领相州都督，余官如故。

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

《通鉴》卷一九四此条下胡注云：

为泰图东宫张本。

胡注甚有卓识，魏王泰夺宫的主要步骤即开文学馆，这与其父当年所为相同，文学馆中，不但“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⑤，学士云集，而且还置有学生。大周故承奉郎吴府君墓志之铭并序^⑥略云：

属魏王以声雄帝子，望重藩维，辟兰坂以翹贤，尊醴筵

而问道，始以才令充府学生……寻为府废，转国子学生。

魏王府文学馆中有学士、学生，成为一个文化同时也是政治中心。“十二年，司马苏勗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⑦太宗在魏王势炙而承乾“慢游无度”之时于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一方面有令太子亲贤人、远小人、习儒术的目的，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建立东宫文化中心以与魏王府文学馆相平衡。唐初，东宫置馆置学生并不罕见，如大周故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并序^⑧略云：

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别教医生。搃衣鹤禁，函丈龙楼，究农皇之草经，研葛洪之药录。

梁师亮卒于万岁通天元年，时年47岁，因而他为左春坊别教医生当为总章、咸亨年间的事。左春坊别教医馆史籍无载，但据墓志我们可以推定它及其生徒的存在。崇贤馆也是如此。太宗既为承乾置馆，魏王府馆中既有学生，则贞观时太子承乾崇贤馆中也一定有学生。承乾在东宫时，崇贤馆置有学士，《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张士衡传略云：

庶人承乾在东宫，又加旌命。及至洛阳宫谒见，太宗延之升殿，赐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贤馆学士。承乾见之，问以齐氏灭亡之由绪。

张士衡为承乾太子时的崇贤馆学士。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六典》所记崇文（贤）馆学士、生徒置于贞观中并不错。崇贤馆的建立，是与当时魏王夺宫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

贞观十七年承乾废，晋王治被立为太子。太宗接受承乾亲小人、远忠谏、自取败亡的教训，更加强了东宫的辅佐纳谏之官的设置，《唐六典》卷二六太子司议郎条云：

太子司议郎四人，正六品上。（贞观十八年置……职拟给事中。）司议郎掌侍从规谏、驳正启奏，以佐庶子、中允之阙。

司议郎之置使东宫文书制度门下省化，这是完善封驳、规谏制度的措施。司议郎置于贞观十八年，更体现了太宗力图立制度约束教育太子的良苦用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崇贤馆学士、直学士更是精心挑选、普遍设置。史籍中可见的学士、直学士有李义府^⑩、李延寿^⑪、马嘉运^⑫、李敬玄^⑬、盖文达^⑭、来济^⑮等，其中来济于贞观十八年以司议郎任崇贤馆直学士，可见贞观十八年后未废崇贤馆，正是要加强太子儒道教育，加强对太子的规谏、辅佐，与司议郎的设置目的一样。晋王升储位后生徒情况如何，尚待考证。

高宗继位后，永徽三年，立陈王忠为太子，此时崇贤馆可能

既无学士，又无生徒。《唐律疏议》卷二三斗讼律殴妻前夫子条云：

非私学者，谓弘文、国子、州县学。

可见永徽时无崇贤馆生。敦煌出土“唐永徽职员令残卷”文书东宫官员中亦未见崇贤馆，可见永徽时崇贤馆学士、生徒制一度被废置，故而《会要》将始置时间记为显庆元年因太子弘置。显庆元年太子弘尚为幼儿，不可能独立提出崇贤馆置生徒之议，站在太子弘背后的，当是高宗朝政治的核心人物——武则天。永徽六年十月，高宗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氏为皇后，七年正月辛未，废太子忠为梁王，立武后子代王弘为太子，壬申，改元为显庆。武则天在己子为东宫后，为巩固其位，继续扩展其政治野心，又想到了当年太宗、魏王夺位夺宫的故伎——置文学馆，故有太子弘置崇贤馆学士、生徒之请。值得注意的是，稍后又有太子宾客之设。《通典》卷三〇太子宾客条云：

大唐显庆元年正月，以左仆射兼太子少师于志宁兼太子太傅、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并为皇太子宾客，遂为官员，定置四人。

文学主要掌“调护侍从规谏”，武后为太子增置文学是为了增强太子羽翼，扩大太子影响，巩固其位，与汉时吕后为太子致商山四皓为宾相似，与崇贤馆置学士、生徒之议目的相同。崇贤馆与宫廷政治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

但崇贤馆的变化并未至此结束。

高宗朝的政治不但影响了太子弘的皇储命运，而且再一次改变了崇文馆的性质。据《会要》卷六四，始置时崇文馆生的简择标准是东宫高级官僚子弟，但这种限制很快被打破了，《芒洛冢墓遗文续编》下大唐故右监门卫中郎将高府君墓志铭并序略云：

君讳嵘……祖士廉，皇朝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申国公，图形麟阁……父审行，皇尚书右丞，雍州长史、户

部侍郎、渝州刺史……君弱冠崇文生明经擢第。

高嶸死于开元十七年，时60岁，若15为崇文生，当是光宅垂拱之际。据两《唐书·高士廉传》，高士廉分别作过太宗和承乾的东宫官，贞观二十一年薨，高宗武后时高士廉非东宫官，故其孙入崇文馆与他两任东宫官无关。高嶸所用荫可能是其功臣食实封者之孙，这也说明，光宅垂拱之际，崇文馆生已不限于东宫高级官僚子孙了，贵胄子孙也可入崇文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如王俊以崇文生应深谋秘策举，其祖高宗封东岳时进士及第，累迁至右金吾将军，冀州刺史、灵州都督，其父为宣州宣城令^{②5}。王俊用祖荫为崇文生，时间在开元年间，父祖皆未任东宫官；又如薛謩，“承前人之复露，补崇文生”，他祖父累绩银青光禄大夫，封龙门侯，父官至大理丞^{②6}，父祖未任东宫高官；又如郭揆，“年十七，崇文生明经及第”，他祖父为朝议大夫，父为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长史^{②7}，郭揆因父荫入崇文馆，但其父生前未任东宫官职，郭揆死于天宝八载，年二十四，则其明经及第在天宝元年，入崇文馆时间在开元末。可见，光宅垂拱后崇文生与弘文生的简择标准一样，不限于东宫官，故而《唐六典》卷八记载为“补弘文、崇文生例”，与《唐会要》卷六四崇文馆条单记崇文生的简择标准不一样了。

崇文馆生简择标准的变化也是当时政治的结果，高宗末年，没有独立的太子，更不能有独立的太子文化中心。崇文（贤）馆的置废变化史，也可以称得上唐前期的政治、宫廷斗争史，夺宫、夺位的斗争赋予了这一太子文化机构的政治敏感性。终于，武后改革了崇文生的简择标准，使崇文馆也变成了一个贵胄子弟入居的学校，东宫三品以上高官子孙当然可入崇文馆，但崇文馆又限于此，从官吏体制上，它属于东宫，但生员简择上，它面向整个官僚，崇文馆从东宫文化中心变为了与弘文馆一样的贵胄子弟宫廷学校，此时，崇文馆的政治意义才彻底消失了。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秘书外省小学，弘文馆还是崇文馆的出现及变化，都与当时政治关系密切，都含有一个建立政治、文化中心的目的在焉。其后的集贤殿书院、翰林院的出现也是如此，而通过建立文化中心达到政治目的，可以看到唐代对儒家学术及对教育的重视。

三

唐前期弘文生三十人（《会要》卷六四，《新书》卷四七作“三十八人”），崇文生二十人。唐后期国家生徒减少，《唐会要》卷七七宏文崇文生举门太和九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云：

奉进止，令减下诸司入仕人，其弘文馆学生见定十六人，今请减下一人，敕旨：依奏。

太和九年前弘文生十六人，其后定额十五人。崇文生数，《新唐书》卷四九上崇文馆条注云：

乾元初，以宰相为学士，总馆事。贞元八年，隶左春坊，有馆生十五人。

后期崇文生15人，二馆生30人，比前期减少了五分之二。开元年间西京国子监六馆生共2260人（国子300，太学500，四门1300，律生50，书生30，算生30）^{②⑧}，后期两监生定员650人^{②⑨}，减少了十分之七，可见与国子监的生员减削相比，二馆显然削减有限。二馆生在国家生员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唐后期二馆与国子监的日渐冷落相反，贵胄子弟争趋赴之，二馆生的简择标准也越来越严格。《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云：

凡弘文，崇文生，皇总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职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姪，功臣身食实封者子孙，一荫听二人选。京官职事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

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荫一人。

这里记载的简补官员与《六典》卷八同，故而它可能是开元年间令式，贵胄子弟争为两馆生，终唐之世不变。大历中，常袞为礼部侍郎，时中官刘忠翼，泾原节度马磷各有亲戚干贡举，又求为两馆生，常袞皆以理执之^③，可见二馆为权臣子弟争入之地。贞元四年，国家又颁布二馆生的简择敕令，《唐会要》卷七七宏文崇文生举门贞元四年正月敕云：

应补宏文崇文生，员阙至少，请补者多，就中商量，须有先后。伏请准建中三年十一月敕，先补缙麻已上亲，次及宰辅子孙，仍于同类之内，所用荫，先尽内地清华，履历要近者，其余据官荫高下类例处分。

补二馆生用荫的标准未变，但补有先后，严格了应补次序。贞元中，许孟容为礼部员外郎，有公主子请补崇文、弘文二馆生，孟容举令式不许，主诉于上，上命中使问状，孟容据理坚持，公主败诉^④。公主子虽是皇亲，但据《唐律》卷一，“缙麻之亲有四，曾祖兄弟、祖从兄弟、父再从兄弟、身之三从兄弟是也。”公主子虽对皇帝有小功之服，但不属于皇帝缙麻以上亲。唐称……亲者，只据父系，母系只能说有……服。公主子只能凭其父官荫入二馆，却不能凭其对皇帝有小功之服而为二馆生。孟容认为公主子不属于三品以上高官，故不许入，而皇帝也无可奈何。此可见入二馆之难。类似的例子还有韦贯之，“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至少府监，荫其子为两馆生，贯之持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当仕。’忠义以艺通权倖，为请者非一，贯之持之愈坚”。^⑤少府监从三品，从官品上可以荫子，贯之坚持的是出身工商，非清华门第。此二例，皆可证明权倖子弟对二馆生的热衷。

《唐会要》卷五九太庙斋郎门略云：

宝历元年九月礼部奏，准今年四月制，当司合厘革条流两馆生斋郎资荫年限等……伏缘两馆生员阙不多，请补者

众，今请一家不得用两荫，许隔二年收补。每用荫补人，请明置簿历，具注所补人年名日月，用本司印，郎官押署。此时二馆生的简择标准更为严格，一家不许用两荫，只能隔二年收补，同时又建立了用荫人簿历，以防“罔冒门荫，变易昭穆”者。同书卷七七宏文崇文生举门云：

开成三年二月两军使状称，请准太和元年五月十七日以前敕，官阶至品，便许用荫，与子孙补两馆生出身。敕旨，神策大将军用荫补两馆生，宜准左右金吾大将军例处分。文宗太和九年甘露事变后，宦官权势炽盛，掌禁军的两军使更是炙手可热。宦官神策大将军仍要求用荫为其子孙求二馆出身，可见二馆生之地位。终唐之世，皇亲贵戚勋臣权倖都争相将自己子孙送入二馆，促使二馆难进，二馆生简补标准越来越向高权贵阶层发展，这是唐后期二馆生的第一个特征。

后期二馆生的第二个特征是考试标准越来越科举化。《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侍郎条云：

其弘文、崇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真正，策试十条，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其试时务策者，皆须识文体，不失问目意，试五得三。皆兼帖《孝经》、《论语》，共十条^③。

这是开元二十四年二馆生的贡举标准，此前“试亦不拘常例，”开元二十四年的标准也只是“粗通文义”，要求比明经进士松得多，同时还根据学习内容设有史科举。开元二十六年，由于二馆生多是贵胄子弟，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者，正月八日下敕令，针对这种情况，要求“一依令式考试”^④，所据令式考试标准，当与《六典》所记开元二十四年者同。二馆生考试标准的改变在天宝十四载，《唐会要》卷七七宏文崇文生举门云：

至天宝十四载二月十日，宏文馆学生，自今已后，宜依国子监学生例帖试，明经进士帖经并减半，杂文及策，皆须粗通，仍永为恒式。

二馆生行帖试，虽帖经减半，但考试方式已与科举同。其后，策问的内容也与明经进士趋于一致。《文苑英华》卷四七五、《权载文集》卷四〇保留了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策明经进士问，在贞元十八年的策明经问中，《春秋》、《礼记》、《论语》下注云“五经、弘文生同”，贞元十九年《礼记》、《论语》下注云：“五经明经宏崇生同”，“明经宏崇生同”。《唐会要》卷七六三《传》门殷侑奏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可见二馆生已不习史科，其考试内容也渐与明经进士一致。此后，国家仍进一步颁布严格考试的敕令，《会要》卷七七又云：

大和七年八月九日敕，宏文崇文两馆生，今后并依式，试经毕日，仍差都省都郎官两人覆试，须责保任，不得辄许替代。

制度上的规定越来越严密，考试内容也越来越难，这是国家政令上对二馆生的科举化，但由于后期政治混乱，二馆生皆为勋贵子弟，二馆生科举化的制度执行起来要打很大折扣，贞元四年正月敕中提到的“未补者务取阙员，已补者自然登第，用荫既已乖实，试艺又皆假人”，制度规定的严格与二馆生及第的容易共同构成了后期二馆生的特色。前者是国家选官、科举制度发展的趋势所致，后者为后期政治形势所定，正因为二者并存，才使勋贵子弟更积极地奔向二馆。

唐后期二馆生选补越来越严格，是自魏晋以来门荫制在唐逐渐衰落，科举制成为官员入仕的重要途径的结果。《通典》卷一七记载魏玄同于武后时上疏曰：

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弘文崇贤之生，千牛、擎脚之徒，课试既浅，技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

弘文、崇文二馆生凭资荫入学，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它是门荫制，但二馆生习业而参加明经、进士考试，与凭资荫入荫及千牛犖脚又不同。安史乱后科举逐渐成为官员的重要入仕途，三卫、千牛等没落，贵胄子弟争趋二馆。二馆是门荫制衰落过程中所剩下的一个重要堡垒。（后期斋郎也未衰，因为斋郎也按科举标准考试）。二馆生从入仕途径看，初门荫、后科举，走的是明经进士及第入仕之路，随着科举入仕的日渐重视，二馆更是常盛不衰。弘文崇文馆进入困难与国子监的公卿子弟入两种矛盾现象都基于同一原因——科举。

唐虽一次次颁布敕令，严格二馆生考试制度，力图将二馆列入科举的轨道，但由于二馆生的贵胄背景，二馆生不可能专心习业，与数以千计的公卿及寒门子弟竞争，假贷自然历禁不免。二馆是介于门荫与科举之间的入仕途径。二馆生可以视为纳入了科举轨道的门荫制的遗留，也可以视为具有门荫色彩的科举制。

注：

-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五年十一月条。
-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条。
- ③《唐会要》卷三五学校门。
- ④《全唐文》卷二六五李邕撰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
- ⑤《颜鲁公集》卷九徐府君神道碑。
- ⑥《唐代墓志汇编》太极003。
- ⑦《芒洛冢墓遗文五编》卷五。
- ⑧《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64。
- ⑨《金石萃编》卷七一姚崇撰于知微碑。
- ⑩《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侍郎条，卷八弘文馆校书郎条略同，惟卷八《东观汉记》作“《后汉书》”，参见高明士：《唐代“三史”的演变》，《大陆杂志》54—1，1977年。
- ⑪《唐会要》卷六四宏文馆门。
- ⑫《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三。

- ⑬《唐会要》卷六四宏文馆门。
- ⑭《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弘文馆条。
- ⑮《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六年春正月乙丑条。
- ⑯《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册。
- ⑰《旧唐书》卷七六。
- ⑱《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8册。
- ⑲《旧唐书》卷八二。
- ⑳㉑《旧唐书》卷七三。
- ㉒《旧唐书》卷八一。
- ㉓《旧唐书》卷一八九上。
- ㉔《旧唐书》卷八〇。
- ㉕《刘宾客外集》卷九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神道碑。
- ㉖《刘宾客文集》卷三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薛公神道碑。
- ㉗《颜鲁公集》卷八河南府参军赠秘书丞郭君神道碑。
- ㉘《唐六典》卷二一。
- ㉙《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
- ㉚《旧唐书》卷一九九常袞传。
- ㉛《旧唐书》卷一五四，《新唐书》卷一六二许孟容传。
- ㉜《旧唐书》卷一〇八韦贯之传。
- ㉝《唐六典》卷八弘文馆校书郎职掌条下有“通六者为第”，是，应补入。
- ㉞《唐六典》卷二考功员外郎条。
- ㉟《唐会要》卷七七宏文崇文生举门。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